

蒋介石的陪都岁月

Chiang Kai-shek's 1937—1946
Provisional Capital of the years

谢儒弟 著



蒋介石的陪都岁月

1937—1946

Chiang Kai-shek's
Provisional Capital of the years



谢儒弟 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蒋介石的陪都岁月 : 1937—1946 / 谢儒弟 著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 2010.7

ISBN 978-7-80741-909-9

I . 蒋… II . 谢… III . ①抗日战争 - 史料 - 重庆市 - 1937~1946 ②蒋介石 (1887~1975) - 生平事迹 IV . ① K265.06 ②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96304 号

蒋介石的陪都岁月 : 1937—1946

作 者 / 谢儒弟

策划编辑 / 文 京

责任编辑 / 竺振榕

特约编辑 / 张玲玲

装帧设计 / 毛 淳

本书部分图片来自 **gettyimages®**

出版发行 / **文汇** 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明辉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20 × 1000 1/16

字 数 / 150 千字 180 幅图

印 张 / 19.5

书 号 / ISBN 978-7-80741-909-9

定 价 / 35.00 元

引言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北平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得悉北平市长秦德纯来电汇报事变情况，当即电令北平守军29军军长宋哲元：“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这一天，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其时乎！”

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日全体将士书》，表示“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自“九·一八”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在经历了数次的军事冲突后，中方终于一改以往一味妥协退让的政策而“决心应战”。一场全民族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战争伊始，中国军队在作战中接连失利，大片国土失守。8月的淞沪会战并未能有效地遏制日寇的西进，首都南京频频告急。10月29日，蒋介石在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以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自此，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

此外，在国民政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因此，重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设置“陪都”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一大特色，又叫“两京制度”，最早始于西周。西周的都城在关中的镐京，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在洛阳首建陪都。此后，历代的大小王朝或因加强对边远地区的控制，或为躲避战乱，或为帝王巡幸狩猎，多有模仿周朝的两京制度设置“陪都”。

抗战前，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抗战爆发后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其主要理由是：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部丘陵地带，市区四周环山，主城半岛长江和嘉陵江环绕，东面又有三峡和大巴山作天然屏障，易守难攻；重庆为长江上游水陆交通枢纽，交通便捷；成都平原紧邻重庆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极大的战略储备资源。

八年抗战时期，重庆从一个中国西南小城一跃成为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国民党与中共）合作的所在地。八年抗战的每一页历史都与这座小城息息相关，历史赋予她的地位和作用，是历代“陪都”无法比拟的。正因如此，重庆也承担了极为惨重的代价。由于地势阻挡，日本陆军无法进入四川盆地，遂改变战略，1938年2月18日起，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近6年的“无差别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

至1943年8月23日轰炸战略停止，重庆市损失惨重，仅市区市民死亡11889人，受伤14100人，房屋毁坏17608栋，重庆市区大半化为废墟，市区工商界的直接损失就达500万美元以上。

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的抉择：是继续蒋家王朝的专制统治，还是走和平民主的建国道路，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了和平谈判并签订了“停战协定”，重庆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

1938年，蒋介石开始担任国民党总裁，加上原来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会长，蒋介石成为独揽党政军大权的“一把手”。同年12月8日，蒋介石由桂林飞抵重庆。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的主要活动都在重庆市。1946年4月30日，

蒋介石离开重庆还都南京。但此后，直到重庆解放期间，蒋介石又曾多次来到陪都重庆。1949年11月30日凌晨1时许，在解放军猛烈的炮火攻击下，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乘飞机仓皇逃离重庆，假道成都飞往台湾，从此一去不返，直至客死孤岛，他的十年陪都岁月就此黯然画上了句号。

纵观蒋介石的政治发迹史，从1908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开始到1949年败走台湾，其间在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任沪军攻浙先锋队指挥官；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曾两次奉命攻打江南制造局；1918年初，到广州陈炯明部任职，后受四川省长杨庶堪推荐拟任四川警务处长，结果遭四川省地方势力的反对返回上海；1922年6月，陈炯明叛乱时，奉孙中山急电返粤，登永丰舰随侍孙中山；10月，被任命为粤军参谋长；次年2月，被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1923年8月，赴苏联考察；1924年任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两次指挥东征，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1926年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排斥共产党人，趁机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监和总司令等职。7月北伐，先后攻占江西、安徽、江苏；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公开背叛革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的武装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主张“攘外必先安内”，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多次“围剿”；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他调集军队围追堵截；1935年3月飞抵重庆，亲自督阵也未能阻止红军长征通过四川；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迫同意第二次国共合作，联合抗日。

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是指挥国民革命军正面战场抗日的最高统帅，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就任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长官，成为国际风云人物。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独享胜利果实，伪装和谈，于8月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和平谈判，却同时准备内战布署，旋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悍然向解放区发动进攻。从此，蒋介石的命运急转直下。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统治中国22年的国民政府覆亡。蒋介石妄图盘踞重庆，割据西南，

伺机再起，但终究气数已尽，如滚滚嘉陵江水一去不返，只能亡命天涯一隅的台湾孤岛。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重庆的山河岁月，见证了蒋介石政治生涯从巅峰走向低谷的全过程，因此，他的陪都岁月别有一番意义所在。抗战期间，他一面联共抗日，一面也从未停止反共，使国共合作历经曲折；尽管如此，两党联合抗日的局面终究还是维持到了最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立场决定了这个时期光明的一面还是主要的。正如美国作家布莱恩·克罗泽对这一时期蒋介石的评价：“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世界性的宣传机构高度评价了蒋介石，称他为一个伟大的民族领袖和国际政治家。”（见《蒋介石传》）毛泽东在1938年9月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中曾称：“先生领导全民族进行空前伟大的革命战争，凡在国人，无不崇拜。”这是毛泽东对蒋介石从未有过的最高褒扬，体现了毛泽东不计前嫌、宽广的革命胸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反共内战，将满目疮痍的民族和国家再度拖进战争的深渊，被共产党人宣布为“头号战犯”，成为历史的罪人。从被国人崇仰的“领袖”到千夫所指的“战犯”，蒋介石身家命运犹如冰炭水火的落差，演绎了昔日“陪都”这位主人公让后人难以释怀的故事……

目录

CONTENTS

- 引言 1
- 一、对汪精卫：从“挽救”到“通缉” 1
- 二、坚持抗战 苦撑待变 19
- 三、谋求“力量集中，意志集中” 37
- 四、复兴关·中央训练团·青干班 59
- 五、紧张忙碌的中枢“内廷” 75
- 六、城郊官邸、“第一家庭”与内廷供奉 91
- 七、居高临危的最高统帅 113
- 八、“与狼共舞”煞费心机 129
- 九、一九四三年：历史的拐点 145
- 十、三青团、青干校及倒孔运动 159
- 十一、智囊戴季陶与吴稚晖 181
- 十二、一寸河山一寸血…… 195

目录

CONTENTS

十三、勉为其难的后方建设 211

十四、华莱士·赫尔利·魏德迈 227

十五、决定命运的历史关头 243

十六、从国共谈判到多党协商 267

十七、和平奋斗与内战危机 281

十八、在陪都的最后岁月 293

参考文献 303

一、对汪精卫：从“挽救” 到“通缉”



撤离武汉之后

1938年10月24日，蒋介石在夫人宋美龄的再三劝说下，驱车赶到武汉飞机场，一同乘机向湖南衡阳飞去。此前一天，广州已落入日军手中；他们飞去衡阳的第二天，武汉也失守了。

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武汉保卫战，从1938年6月至10月25日，历时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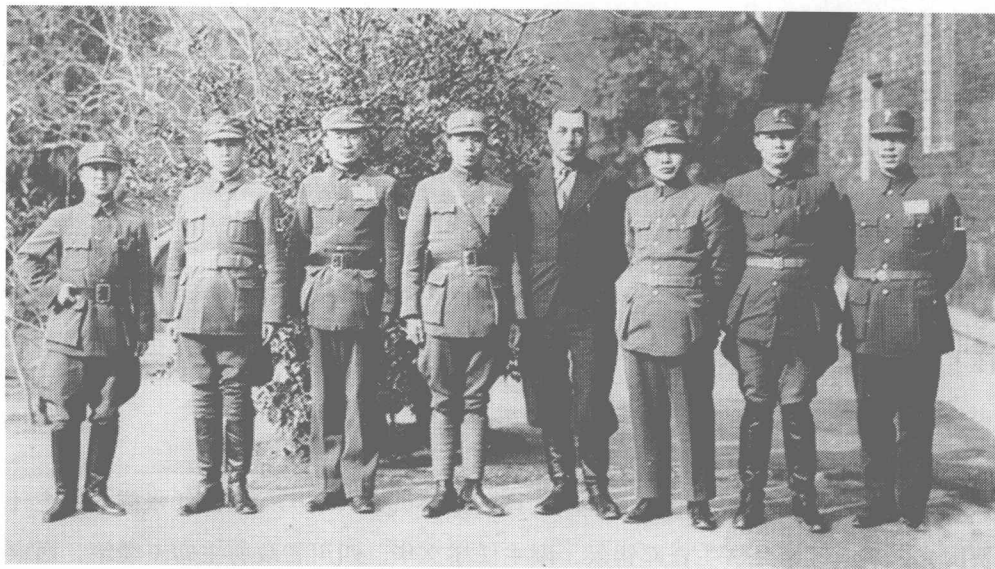
1938年7月4日，蒋介石在汉口主持最高军事会议。（摄影：Robert Capa）

陈立夫回忆：撤离武汉化险为夷

抗战时期，从汉口撤离本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乘飞机，另一条路乘船过洞庭湖，经长沙到贵阳，再到重庆。当时朱家骅兄要我和他同搭飞机走，陈布雷兄要我和他坐船走。他们两人都送票给我，我当时很难决定，究竟跟谁一同走，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是很少做梦的人），梦见天上有一只老虎跳下来要咬我，我惊醒过来想想该怎么办呢？天上有虎下来是不是象征着祸（虎）从天上来，那我就往天上去，总不会错的了！我遂决定乘飞机，乃写信给陈布雷兄将船票璧还，告诉他很抱歉不能和他同行，我要跟朱家骅兄乘飞机去重庆了。是日我们平安地到达重庆，不料不久就接到电报消息说洞庭湖上那艘船被日本飞机发现，他们认为那船上一定有重要人物，因此便冲下来以机枪扫射。我第一个感觉是：糟了！陈布雷兄遇险了！后来陈到了重庆，他对我说：“这次我差点做了一件大错事，我住的船舱有两张床，一张我睡，另一张本是准备给你睡而空在那里的，那天日本飞机机关枪扫射下来，刚好有三颗子弹打中你的床，那三颗子弹一定把你打死了！真是谢天谢地你没有跟我哭！”

个月，消灭敌人有生力量10万之众，中国军队退入山区准备反攻，留给敌人的是一座空城。这是日军对中国发动全面的军事战略进攻的顶点，也是一期抗战结束的标志。蒋介石原想在武汉再呆几天，继续指挥抵抗，不料于24日即提前来到衡阳南岳，使这里的军政人员措手不及，赶紧为蒋宋夫妇打扫住房，布置军事会议的会场和到会高级军事将领们的住地。

在这里，蒋介石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会议除有第三、第九战区的总司令、军团长、军长、师长等高级将领两百余人出席之外，还邀请有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等参加。蒋介石主持开幕式，他说：“从前我们所说从开战到南京陷落为第一时期，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为第二时期，保卫武汉为第三时期，这种说法都不适当，应即改正。我们这次抗战，依照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退军、岳州沦陷为止，这是我们抗战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他指出，第二期抗战的特质，在“转守为攻，转败为胜”，要“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训练重于作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而



南岳军事会议后，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国民政府在南岳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并邀请八路军代表担任教学。图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负责人合影，右起：蔡剑鸣、叶剑英、汤恩伯（教育长）、季维诺夫（苏联顾问）。

召开南岳军事会议的最大目的，就是要“整理军队，建立军队”。根据当年4月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精神，他指出：“抗战就是建国，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要求作为部队的长官，“要作为建军的中心”，“必须特别讲求学问、技术，……要多看书，多研究，尤其对于总理（孙中山）遗嘱所列举的几种书籍，要时常拿来温习研究。”

蒋介石还说，要分三期轮流整训全国部队，“即将全国现在部队之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等到第一批整理完成，仍调回前方作战，或担任游击，乃调换第二批到后方，继续整理；第二批整训完毕，再依次抽调其余未经整训的部队。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据此，会议提出了二期抗战的战略部署：减少指挥层次；根据敌我相持的新态势，重新划分十个战区；设桂林、天水两行营，并撤销广州、西安、重庆行营；设置沦陷区专管机关——战地党政委员会，直属军事委员会；开办数期游击干部训练班。

为达到“转败为胜”的战略目的，蒋介石提出二期作战指导方针，他要求：“国军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从而牵制消耗敌人，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

10月28日，军事会议刚结束，蒋介石即接到来自四川的一封密电，说：

蒋委员长钧鉴：粤汉阵地转移，四川实为南北枢纽，且人力物力，为西南各省之冠，复兴根据，责任重大。拟请钧座莅临驻节，以便统筹全局，对于发动全民力量，收效更迅。

在密电上署名的是主持四川军政大计的主要负责人重庆行营主任张群、副主任贺国光，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副主任潘文华，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缙绪，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及各集团军总司令杨森、唐式遵、王陵基、孙震等头面人物。此刻，距蒋介石在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上发表关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讲话已足有一

年之久，大后方的建设已初步就绪，中央政府和四川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已得以克服，团结抗战的局面似乎已更加巩固。

12月1日，蒋介石由湖南衡阳抵达广西桂林，布置了华南军事作战事宜；8日又在那里主持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收复广州及防卫西南的战略。之后，即于同一天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委员长侍从室人员及其他军事组织人员，在宋美龄陪同下，飞抵战时首都重庆。

蒋介石到达重庆的当天，住进了南岸的黄山官邸，并于第二天（即12月9日）在那里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按照南岳军事会议确定的战略、政略方针，他要把国民党全党的意志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党务等一切方面，都集中到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这一基点上来，并由此去集中全体国民的精神和意志。他早在武汉

贺国光：从杂牌军上来的“第一任”市长



陪都重庆第一任市长贺国光

贺国光，字元璋，湖北蒲圻人。早年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和《革命军》的作者邹容是同学。后随老父入川，以堂兄四川兵各道贺伦夔的推荐，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与后来在川省翻云覆雨的刘湘、杨森、潘文华、唐式遵等成为要好的同学。

但与这些同学不同的是，经过多年战场摔打的贺国光最终投向了蒋介石，并且由于其精明干练，文笔敏捷，尤其擅长参谋业务，被蒋介石所赏识，逐次提拔重用，由无根基的杂牌将领，成为国军统帅部的智囊之一。尤其1935年红军开始长征后，蒋介石不仅指挥中央军及湘、桂、粤等军尾追，还令组织军事委员会入川参谋团，指导川军堵截红军。与川军实力派领袖刘湘、杨森有同窗之谊的贺国光成了担任团长的不二人选。

1935年，贺国光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进驻重庆。除了围堵红军之外，他还小心周旋于各军阀之间，以整理四川各军，统一中央军政命令。

1936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副主任、代主任，次年又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国民政府改重庆市为行政院直属的特种市，11日又改组重庆市政府，任命贺国光为重庆市市长，是为重庆改为国民党中央政府直辖后的第一任市长。



陪都时期的国民政府大门，在今重庆市人民大礼堂对面。

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说过：“此次中日战争是国民革命过程中无法避免的一战，也是日本蓄意灭亡中国的大陆政策和本党挽救中国的革命政策绝对冲突的必然结果。”而国民党呢，他觉得像是老掉了牙，派系林立，十分涣散，不经他亲自整顿，再创一个坚强的核心，又如何能够领导这挽救中国的国民革命？面对国与国之间残酷而持久的战争消耗的巨大压力，他首先想到的是兵源、武器和粮食，及民众的广泛支持，决定开展一个声势浩大而持久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而且，口号都有了，共三句话 24 个字：“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力量集中，意志集中。”前两句是《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提出的；后一句则是由身边的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替他想到的，含义是：全党及全国民众的力量和意志，都必须集中在“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之一点上。在蒋介石心目中，这一切自然都是建立在“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这个不可动摇的基点上。但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却不这么看，反倒认

定“坚持抗战，中国必亡”，一味地想跟日本人“言和”，暗地里正在向着叛国投敌的深渊迅猛滑去。

汪精卫积极求和

从10月25日武汉失守之后第二天起，当蒋介石正忙于在南岳和桂林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对日抗战之际，汪精卫却在重庆上清寺的寓所里召集陈璧君、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讨论如何开展对日和平活动和离开重庆另外组织新政府之类的问题。10月30日，他们讨论到深夜，才决定派梅思平会同留在香港的高宗武再去上海跟日本人作进一步的联系。11月2日，梅思平返回香港；第二天，日本政府即按汪精卫的要求，发表了第二次对华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在坚持要中国承认“满洲国”的前提下，修改了第一次声明中“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论调，提出“只要国府放弃以往的政策，更换人事组织，日方并不拒之门外”的说法。这篇声明打着实现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和实现经济合作的幌子，希望中国分担日本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责任，而其所谓“更换人事组织”的先决条件，实即要求蒋介石下野，另以新的中国领袖出来收拾局面，配合日本控制中国。这个“新的领袖”，即暗指汪精卫。

针对言和派“抗战必败”的悲观论调和日寇的狂妄野心，11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上再次强调抗战到底的决心，他说：“中国抗战前途日益光明，在各条战线上的中国军队，已退到山区，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对我方有利。主要是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无足畏惧。”蒋介石讲这话的时候，显然还不了解，日汪勾结组织所谓中国“新中央政府”，要将以他为核心的重庆国民政府取而代之的阴谋，已策进到何种程度。



到处宣传与日和谈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

而此刻，正是梅思平到香港之后，密谋与日“言和”的重要时刻。他按汪精卫的意图，与高宗武会合，分别于11月12、13日抵达上海，并于14日开始和日方今井武夫（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就梅思平带去的经汪精卫拍板定稿的和平基本条件展开会谈。15日，今井返回东京汇报，18日随影佐祯昭返回上海。20日继续谈判，到当天下午7时双方签署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另外有《日华秘密协议记录》暂未签字。三项文件的主要内容有：承认“满州国”；共同防共，承认日本在华防共驻兵，内蒙为特别防共区；承认日本人在华居住、营业自由，日本废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人优先权；补偿因事变而造成在华日本侨民所受损失，日本不要求赔偿军费；本协议以外的日本军队于恢复和平后，立即开始撤兵，两年内撤完。其中所谓“撤兵”，“不要求赔偿军费”都是骗人的鬼话。由于这次谈判是在上海虹口体育会路七号即所谓“重光堂”举行的，这个秘密协议又通称“重光堂协议”。

这三份随即为日本御前会议通过的协议文件，决定以汪精卫为对手，支持组织“新中央政府”，同时附有一份近卫第三次声明的所谓“方案”（草稿），除了提出“承认满洲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外，最后一句话则警告说：“当然国民政府及其军队如执迷不悟，继续抗日容共，帝国则不见到其彻底消灭，决不收兵。”这次重光堂密谈，还制定了一套汪精卫出国及近卫发表宣言的详细计划和日程。按照这个计划，汪精卫应于12月5日以前离重庆到昆明；日本政府在收到汪精卫到达昆明的电报后，即发表和平条件，汪精卫随即飞河内转香港；到达香港后，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发表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采取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声明，并向全国军民及海外华侨广播。

梅思平依照“重光堂约定”，于11月26日密带协议文件和近卫声明草稿返回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汪精卫细读文件之后，在上清寺宅邸召集周佛海、陈璧君、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人详细研究，同时讨论往后的行动计划。汪精卫考虑再四，游移不定，疑虑难安。与会众人连日讨论，最后决定在对日方的答复中明确四点：（一）承认重光堂会谈的日华协议记录；（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应明确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中国内政；（三）汪精卫预定12月8日离开重庆，10日到达昆明，希望